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 100 學年度 世界史研習營——學術系列講座（第一場）



時 間：10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三），13：40～15：30

地 點：文開樓三樓 LE3A 會議室

主講人：李若庸先生

現 職：台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講 題：亨利八世朝的言論箝制與宗教迫害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歷史學系敬邀

業務承辦人：謝璧如

連絡電話：2905-2307

電子郵件：051811@mail.fju.edu.tw

忠君或虔信？ 知識菁英與亨利八世的對抗及妥協

李若庸*

摘要

一五三四年，亨利八世透過國會通過「繼承法」(Act of Succession)，宣告安·葆琳所新生的伊莉莎白公主為王位的正統繼承人。「繼承法」有個附帶決議：所有英格蘭臣民都需公開宣誓，接受法案的內容與其引以為據的「國王至高權」(Royal Supremacy)理論。隨後，國會又通過「叛國法」(Treasons Act)。依據此法，拒絕承認「繼承法」者視同「叛國」，得處以「叛國罪」。一五三四年的法案讓英格蘭臣民面臨新一波的挑戰：他們必須決定是否捨棄羅馬教廷，改奉國王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Supreme Head)。亨利八世為確保全國人民的支持，全面且系統地要求臣民就「繼承法」的內容宣誓。他透過勸說、施壓、逮捕、以及處決的手段，獲取朝中菁英的承認。亨利八世的作法激起極大的波瀾：被要求表態的菁英們不再享有緘默的空間，所有意見領袖都被要求表態。亨利八世大規模地「翻攪」英格蘭的菁英階層，卻不見菁英們有效的抵制與反抗。文藝復興時代的英格蘭養成了許多受過良好人文主義訓練的知識菁英，他們無論在學識或教養上，都有足夠的能力評斷國王的言行。他們為何未能阻止國王進行激進作為？當亨利八世大力翻攪英格蘭王國之時，他們有何考量？如何判斷？做何選擇？本文將依反應模式，將亨利朝的知識菁英分成三類來討論：他們分別是「殉道的菁英」、「流亡的菁英」，以及「屈服的菁英」。透過這三類菁英個別處境的探討，重建菁英階層的思維與心態，藉此理解他們的反應與作為。

* 國立台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成大歷史學報》第三十八號
2010 年 6 月，頁 53~88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BIBLID1683-9794 (2010.6) 38. pp.53~88

關鍵詞：亨利八世、迫害、知識菁英、宗教改革

忠君或虔信？知識菁英與亨利八世的對抗及妥協

李若庸

一、殉道的菁英

二、流亡的菁英

三、屈服的菁英

四、結論：亨利八世與他的知識菁英

在反對王后的那群大臣中，有許多人對國王拒絕承認羅馬教會權威一事，感到不滿。諾弗克公爵（duke of Norfolk）便是如此。¹他向法國大使表示，他與他的友人都不會同意此舉。這件事傳到了國王耳裡，他已經著手調查。公爵惹上麻煩了；我想這是不喜歡在宮裡走動的原因。²

這是 1534 年 3 月，西班牙駐英大使喬比（Eustace Chapuys，1489–1556）寫給主上查理五世國王（Charles V，1500–1558）的報告內容。它透露出當時英格蘭宮廷的緊張氛圍：亨利八世與出身西班牙的凱撒琳王后（Katherine of Aragon，1485–1536）間的婚姻爭議，因為 1533 年初亨利與安·葆琳（Anne Boleyn，c.1500–1536）的成婚而大致底定。³同情凱撒琳的人士對此結果不無遺憾，但這是國王私人的家庭與感情問題，國王的決定未必盡如人意，但身為英格蘭子民，沉默接受仍是唯一的選擇。

然而，看似平靜的狀況在 1534 年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葆琳在 1533 年 9 月生下女兒伊莉莎白（Elizabeth I，r.1558–1603）。亨利於是在 1534 年 3 月，透過國會通過

¹ 「諾弗克公爵」指的是 Thomas Howard（1473–1554），他是安·葆琳的舅父，是以屬於「反凱撒琳」的陣營。然而 Howard 家族一直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² J. S. Brewer, J. Gairdner & R. H. Brodie (ed.),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21 vols. and addenda (London: Longman & Co., 1862–1932), vol.7, no.296. (以下稱為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³ 亨利八世與安·葆琳在 1533 年 1 月，由亨利一手提拔的坎特伯里大主教克蘭默（Thomas Cranmer，1489–1556）祕密證婚，爾後在 6 月公開加冕。

「繼承法」(Act of Succession, 25 Henry VIII. c.22)，宣告凱撒琳所生的女兒瑪麗公主(Mary I, r.1553-1558)為「私生女」(因其父母的婚姻無效)，正統的王位繼承人為新生的公主。⁴「繼承法」有幾項重要的後續發展：首先，它隨後通過一項附帶決議，要求「所有英格蘭臣民」一旦被要求，就需就此法公開宣誓。「宣誓」意謂著接受法案的內容，以及該法案引以為據的「國王至高權」(Royal Supremacy)理論。另一項重要的後續發展是「叛國法」(Treasons Act 1534, 26 Henry VIII. c. 13)的通過。依據「叛國法」，凡是拒絕承認「繼承法」的人，其行為視同「叛國」，得依「叛國罪」(high treason)處以極刑。⁵

1534 年的「繼承法」讓英格蘭臣民面臨另一波的挑戰與抉擇：他們這次要決定的不是「接不接受新的王后」，而是「要不要放棄羅馬教廷」，奉國王為獨立的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Supreme Head)。英格蘭臣民的為難處境在喬比的報告中充份展現出來：宮中的保守派諾弗克公爵雖然支持葆琳，卻不贊成國王與羅馬決裂。這篇報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諾弗克的反對意見已「傳到國王的耳裡」，國王正在「著手調查」。

諾弗克面臨來自國王的壓力，他的際遇並不特別，他所遭遇的是所有亨利朝菁英 1534 年後共同經驗：亨利八世為了「確保」(「強迫」一詞或許更為貼切)全國人民對其政策的支持，全面且系統地要求全國臣民(尤其針對具指標意義的宗教團體與意見領袖)就「繼承法」的內容表態接受。此政策在地方的層級是由當地的主教或教會核心人士執行；他們負責「督導」重要人士與組織成員(如修院裡的修士)連署支持法案。在中央方面，國王則針對個別朝臣與意見領袖，透過勸說、施壓、甚至逮捕、處決的手段，獲取支持。亨利八世顯然決定不惜代價。

亨利八世的強勢作為激起極大的波瀾，不僅在歐陸人們議論紛紛，英格蘭境內也掀起大規模的白色恐怖。政治菁英們不再享有緘默的空間；從朝中大臣到滯留海外的意見領袖，都被要求表態支持。可以說在 1534 年之後，英格蘭境內再也沒有人能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政策，置身事外。

令我們深感困惑的是，亨利八世如此大規模地「翻攪」英格蘭的統治階層，為

⁴ 此法在 1534 年 3 月通過，但因「法律之紀年」以每年的 3 月 25 日為一年之始，所以法案的正式名稱為「1533 年王位繼承法」。

⁵ 在此之前，拒絕接受亨利八世政策者僅處以「褫奪公權與沒收財產」(attainder)之罪。此舉顯示亨利八世意欲透過修法，增加他給予反對者的壓力與懲處。

何不會激起有效的抵制與反抗？換個角度說，亨利八世的英格蘭國教會不是在密謀中建立；它是個「眾聲喧嘩」，震動全歐洲的宗教革命。如同許多宗教改革學者的研究顯示，英格蘭在 1530 年代大部分人仍然信奉著「傳統信仰」(traditional faith)。這個歐陸邊緣的「化外之國」，一般民眾對於天主教會（乃至羅馬教廷）的認識或許極為有限，但是，英格蘭在這段期間養成了許多受過良好人文主義訓練的知識菁英（知名的《烏托邦》(Utopia)作者湯瑪斯·摩爾爵士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便是其一)；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雖然對教會曾提出嚴厲的批評，但仍視羅馬教會為基督教世界的正統。這些知識菁英無論在知識或學養上，都有足夠的能力判斷國王的言行。對他們而言，國王的許多說辭與其稱為「辯護」，不如論為「狡言」。我們因此要問，這些知識菁英既然有能力辨識真相，何以沒能阻止國王的激進作為？他們為何沒有形成牽制力量？當亨利八世大力翻攪英格蘭王國時，他們在思考什麼？他們做何判斷？如何選擇？

這些乍看之下零散的問題，其實彼此間息息相關。因為亨利八世 1534 年開始的強勢作為，牽動了整個的英格蘭宮廷，所有菁英都牽扯在內。知識菁英既然與此階段的政治變化密切關聯，他們的思維與決定也就影響著局勢的發展。所有問題因此匯集成為我們的核心提問——「亨利朝的知識菁英為何未能形成阻止國王一意改革的力量？」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將依反應模式，把亨利朝知識菁英分成三類來討論：他們是「殉道的菁英」、「流亡的菁英」，以及「屈服的菁英」。這三類菁英有其個別處境與考量，也分享著共同的價值與信念。本文設定兩個寫作目的：一是重現亨利朝知識菁英身處的險惡境況，為他們的歷史經驗留下記錄。二是透過理解菁英們的情感與思維，來尋找核心問題的解答。如同諾弗克的例子所顯示，亨利朝菁英多不贊同國王脫離羅馬教會的決定。他們為何寧可選擇屈服、流亡，甚至殉道，也不願意集體反抗？他們共同的選擇（或者說「不選擇」）代表著何種意義？它反映著知識菁英存在著的共同價值嗎？這些是本文要探討的面向。

除了上述問題，本文還有兩個在學術史上的研究企圖。英格蘭「官方宗教改革 (Official Reformation) 的成功」始終是學界關心的重點。亨利八世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完成艱難的「官方宗教改革」？研究者一直想要找尋答案。近年來「合作論」(cooperation) 在英國學界逐漸成為主流。青壯學者如沙根(Ethan H. Shagan)等

人以「合作」與「利益共享」的角度，來解釋英格蘭臣民「協助」官方宗教改革的完成。⁶

「合作論」同樣激盪了本文對知識菁英的思考。在探討亨利朝菁英看待國王宗教改革的反應時，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他們出現過各種選擇——屈服、流亡、殉道，唯一沒有出現過的選項就是「集體反抗」。亨利八世在 1530 年代的作為極其強勢，他給予整個菁英階層很大的壓力。然而即便如此，「有能力」的菁英（不管是基於知識抑或實力）也不曾集合起來，公開與國王對抗。⁷為什麼如此？什麼樣的考量與躊躇讓他們放棄了這個選項？這是本文想要探討的議題。而問題的答案或許有助於我們對「合作論」的內涵，進一步地瞭解。

此外，本文也希望與整個都鐸王朝，乃至於十七世紀的英格蘭歷史研究對話。1642 年至 1651 年間，英格蘭發生了改變歷史軌跡的重大事件——「大內戰」(The Civil War)。查理一世 (Charles I, r.1625-1649) 因為與國會激烈衝突，最後導致軍事對立。國王在內戰中失去了王位，英格蘭進入沒有君主的「共和時期」。從「都鐸盛世」落入「亂世內戰」，英格蘭在一百年間的變化劇烈。「大內戰問題」因此成為英格蘭史上重大的研究課題。學界的大內戰解釋傳統認為，英格蘭在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之間，在政治、社會、乃至於宗教上都經歷重大的轉變。這些「潛在」的歷史變化，最終匯流成為十七世紀中葉的激烈衝突。

延續「大內戰」的研究傳統，我們可以回頭這樣探討目前的宗教改革議題。「大內戰」的爆發突顯了斯圖亞特家族 (House of Stuart, 1603-1714) 統治上的重大缺失。我們必須要問，與斯圖亞特家族比較起來，十六世紀的都鐸王朝並未享有更為豐厚的統治資源：王室沒有常備軍隊，財政收入經常捉襟見肘，⁸甚至地方的重要職位（如保安官 (Justice of Peace) 等），都得仰賴熱心人士的無給擔任。這樣「脆弱」的政府，卻能支持亨利八世「強悍地」推動宗教改革。都鐸王朝的特殊性，確實值得探討。我們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這個問題：繼都鐸家族之後統治英格蘭的斯圖亞特王室，它失落了何種重要的統治特質或資源，以致在相對溫和的統治

⁶ Ethan H.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⁷ 即使是 1536 年發生在英格蘭北部的「聖寵朝聖行」(Pilgrimage of Grace) 也不具備此種特性。英格蘭的「政治菁英」(貴族) 並非一貫地如此順服：1215 年，貴族迫使約翰王簽下歷史上的重要文獻「大憲章」(*Magna Carta*)，便是一個著名的貴族反抗例子。

⁸ 亨利八世在 1523 年欲徵收「恩稅」(Amicable Grants) 來支付對法戰爭的花費時，便遭遇重重阻礙。

時代（尤其相對於都鐸諸王動盪卻堅決的宗教立場及政策），竟然落得革命遜位的下場？本文認為，探討都鐸菁英的思維模式，能為上述問題找到部分解答。

一、殉道的菁英

在所有殉道的菁英中，最為人所熟知的是《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摩爾爵士。他在 1535 年 7 月因為拒絕接受「繼承法」中否定羅馬教廷「首席權」的內容，而被亨利八世以叛國罪處以極刑。然而，與摩爾同時殉道的還有另一位較不為人所熟知的知識菁英，他與摩爾因同樣的罪名被囚禁在倫敦塔監獄，並且與摩爾一同在 1535 年處決。他是「羅徹斯特主教」約翰·費雪（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1469-1535）。⁹費雪的名聲在後世不如摩爾響亮，但他的學識與品德，在當代（無論在英格蘭或者歐陸）都深受敬仰。他比摩爾早一個月踏上行刑臺，殉難時已屆六十六歲高齡，並且痼疾纏身。亨利八世以極其殘酷的手段處決這位得隆望重的孱弱主教，在當時輿論引起極大的震盪。亨利絕決的意志與嚴酷的手段在處決費雪一事上展露無遺。費雪是第一位被亨利八世公開處決的意見領袖。他的死宣告了亨利八世對知識菁英「溫和勸說」政策的結束，他將以嚴厲的手段來對待異己。費雪的殉道具有相當大的指標意義。

「學者」（scholar）與「教士」（priest）是對費雪最貼切的描述。他出身英格蘭北部約克郡的商人家庭。受到改革派神學家密爾頓（William Melton, d.1528）的啓

⁹ T.E. Bridgett 的 *Life of Blessed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and Martyr under Henry VIII* (London: Burns & Oates, Limited, 1888) 是費雪最早的傳記。不過 Bridgett 本身是教會人士，因此對費雪充滿著同情與瞭解，在觀察角度上難免有失客觀。然而，此書仍是研究費雪生平值得參考的專著。Bridgett 之後，Edward Surtz 亦曾以專書討論過費雪： *The Works and Days of John Fish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sition of St. John Fisher, 1469-1535, Bishop of Rochester,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Brendon Bradshaw 與 Eamon Duffy 則在 1989 年編纂了一本論文集， *Humanism, Reform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Career of Bishop John Fis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此書是對費雪學術最新的反省；書中論文修正傳統將費雪視為「保守的中古教會人士」的印象；此書主張費雪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唯有從此角度切入，才能真正理解費雪的學術。在所有關於費雪的研究中，Maria Dowling 的 *Fisher of Men: A Life of John Fisher, 1469-1535*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最為重要。Dowling 的專長在研究英格蘭的人文主義傳統，其代表作為 *Humanism in the Age of Henry VIII* (London: Croom Helm, 1986)。Dowling 亦將費雪放在人文主義的脈絡下觀察；她在書中剖析費雪的幾個角色：大學講師、人文主義者、主教、傳教士 (preacher)、異端的打壓者 (opponent of heresy)、虔信的作者 (devotional writer)、以及不屈從的政治人物 (reluctant politician)。她給予費雪的思想新的定位。此書對於費雪為天主教會辯護的作品，有精闢的分析。

發，費雪很早便對信仰課題充滿興趣。他在十五歲時進入劍橋大學就讀，學成後便在學校出任要職。費雪擔任副校長（Vice Chancellor）期間，致力於提升劍橋的古典學術，提倡拉丁文、希臘文，以及希伯來文作品的閱讀。1504 年，費雪被任命為「羅徹斯特主教」。「羅徹斯特」是英格蘭最貧窮的教區，神職人員通常將之視為「教會職涯」的第一步；然而費雪卻在這裡待了三十一個年頭，直至 1535 年被亨利八世解除職務。費雪的虔誠與安貧，由此可見一斑。

費雪的思想較接近「基督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的傳統。他對於教會的弊病體會甚深，因此自律極嚴，一輩子都以安貧自許（據說他立志成為一位「模範主教」）。然而，身為一位天主教徒，費雪捍衛羅馬教會「正統地位」的立場亦極堅定。他在 1520 年於聖保羅大教堂首次公開抨擊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這場演說極為成功，演講的宣道詞後來發行了五種版本。而他的《駁斥路德的主張》（*Assertionis Lutheranae Confutatio*）一書，總共印成了十九個版本，包括再版四次的德文譯本。¹⁰曾有史家認為，亨利八世反擊路德所撰寫的名著《捍衛七項聖禮》（*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 1521），實際的執筆者其實是費雪（諷刺的是，此作品為亨利贏得「信仰捍衛者」（*Fidei defensor*）的稱號）。¹¹費雪也曾毫不留情地逮捕新教神學家庭戴爾（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的追隨者希頓（Thomas Hitton, d.1530）。希頓在費雪的審訊與刑求後，被處以異端焚死之刑。凡此種種都顯示，費雪以其學養與虔信，擔負起英格蘭天主教會支柱的重責。

費雪與都鐸王室的淵源深厚。亨利七世的母親「蒲福夫人」（Lady Margaret Beaufort, 1443-1509）在他的勸說下，於劍橋設立「聖約翰」（St John's）與「基督」（Christ's）學院，提倡古典學術。1509 年，亨利七世與蒲福夫人相繼去世，費雪擔起王室葬禮上的宣講工作。而繼任的亨利八世在王儲時期，亦曾受教於費雪，是他的學生。

費雪與都鐸家族的緊密互動在亨利與凱撒琳的婚姻問題浮上檯面後，備受考驗。費雪是凱撒琳堅實的支持者；他代表凱撒琳在離婚法庭上發言，主張凱撒琳與

¹⁰ John Fisher, *English Works of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1469-1535): Sermons and Other Writings, 1520-1535*, ed. Cecilia A. Ha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9-10.

¹¹ 路德本人在 1522 年曾經質疑《捍衛七項聖禮》一書是由亨利八世親自執筆。他認為，約克大主教愛德華·李(Edward Lee, c.1482-1544)或其他宮廷文膽才是真正的作者。由於費雪曾撰寫許多反駁路德的策論，因此也有史家猜測他是實際的撰述者。不過 Cecilia A. Hatt 對此不表贊同。她認為兩人的寫作風格差異甚大，費雪的論證比亨利八世要細緻許多。見 Fisher, *English Works of John Fisher*, p.114.

亨利的婚姻合法有效；在上帝面前締結的婚約，生死不渝。他甚至表示，願意以生命來捍衛此立場。¹²

費雪的堅持最終爲他帶來災難。1532 年開始，亨利八世開始積極推動他的離婚「計畫」：5 月，摩爾因立場歧異，辭去「大法官」(Lord Chancellor) 之職。8 月，亨利八世一手提拔的克蘭默 (Thomas Cranmer, 1489-1556) 繼任爲坎特伯里大主教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克蘭默隨即在隔年 1 月爲亨利八世與安·葆琳祕密證婚。1533 年 3 月，費雪首次被捕入獄。¹³他在 6 月間被釋放，但國王的舉措是個嚴正的警告，費雪倘不改變立場，必會面臨更爲嚴酷的對待。

1534 年「繼承法」通過，所有人都被要求宣誓承認。費雪堅持羅馬教廷的首席地位，再度被關進倫敦塔監獄。¹⁴費雪當時已屆六十五歲高齡，並且身染重病。他在塔中監禁逾年，得到極爲惡劣的起居與飲食對待。費雪的乞憐處境，令人印象深刻。他在寫給「祕書大臣」(Lord Secretary) 克倫威爾 (Thomas Cromwell, 1485-1540) 的信中說道：

我乞求你能在我窘迫的時候照護我：我既沒有襯衣也沒有床單，沒有足夠的衣服可穿，只有令人羞赧的襤褸衣衫。更別說，它們即使能夠使我保暖，我也很可能犯病。我的飲食也是。上帝知道，它經常少得可憐。在我這個年紀，我的胃需要一點肉類，不然的話，我很快會撐不住，不停咳嗽，身體不適，無法保持健康……(從倫敦塔，12 月 22 日)。¹⁵

費雪的處境實在不堪。姑且不論他望重士林的菁英領袖身份，就以一位羸弱老者考量，他的待遇亦有違人情。他被迫卑微地請求基本的物質供給，以便「保持健康」。波爾 (Reginald Pole, 1500-1558) 對費雪的狀況描寫得相當詳盡：¹⁶

說到羅徹斯特主教〔指費雪〕，他從監禁的漫長苦難中存活下來。想到他的年紀，

¹² 亨利八世對於費雪的發言極爲惱怒，曾親自提筆給坎貝吉歐 (Lorenzo Campeggio, c.1471-1539)，爲自己辯護。Richard Rex, "Fisher, John [St John Fisher] (c.1469-1535)",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以下稱爲 DNB),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9498, accessed 17 May 2010].

¹³ 此次逮捕的主要目的在阻止費雪妨礙葆琳於六月的加冕典禮。費雪因此在六月的典禮後不久便被釋放。Rex, "Fisher, John [St John Fisher] (c.1469-1535)", DNB.

¹⁴ 在此期間，費雪於三月亦曾入獄一次，最後是以三百英鎊的罰鍰，換回自由。可以說，自 1533 年開始，費雪便不斷地進出倫敦塔獄。Rex, "Fisher, John [St John Fisher] (c.1469-1535)", DNB.

¹⁵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7, no.1563.

¹⁶ 關於波爾，見本文第二節的討論。

他脆弱的健康狀態，以及身體的瘦弱，誰會相信他能撐過一個月？確實，三年前我離開英格蘭時便認為，他即使待在自己家裡盡可能地靜養，依他的病況也活不過一年。我後來聽說，他在奉召前往倫敦入監的途中，因為虛弱，昏厥了好幾次。現在，他竟能在那有礙健康的污濁監獄存活十五個月，誰看不出來，這是上帝的手，超越自然的力量，延長了他的生命。¹⁷

費雪的處境引起歐陸極大的關注。1535年5月，新任的教皇保祿三世（Paul III, r.1534-1549）決定賦予費雪樞機主教的頭銜。¹⁸此舉大大激怒了亨利八世。他表示：樞機主教的冠冕（cardinal's hat）不准進入英格蘭，他會「將費雪的項上人頭奉上。」¹⁹不久，費雪就被正式審判，他被控拒絕承認「國王為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領袖」，觸犯「叛國之罪」。風燭殘年的貧病主教，被判處公開「吊死」（hanged）、「水淹」（drawn），再「大卸四塊」（quartered）的極刑！最後，亨利八世顧慮對費雪過於嚴厲的懲罰，反而為他贏來群眾的同情，遂改在倫敦塔內斬首處決（6月22日）。²⁰目睹行刑過程的法官萊斯托（William Rastell, 1508-1565）對當時的費雪留下一段令人動容的描述：

他的外袍與聖帶（tippet）²¹被取下；接著，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站起身來（超乎預期的人眾聚集在此見證這場駭人的處決，我也是其中一人）——一個修長、乾瘦的軀體，只剩下皮包骨。在場的人大多深感驚訝，怎麼有人如此枯槁卻還能活著，因為他看起來像是一具乾癟的屍身，沒有一點筋肉，猶如死亡現身，或者可以說，是有著人的形體，使用人的聲音的死亡。²²

費雪臨刑時的形象確實駭人。處決後，他的屍身被剝去衣物，留置在刑台示眾，直至夜幕。屍身最後被拋置在教堂後院的無名塚，連最起碼的葬禮祝禱也沒有舉行。費雪被砍下的頭顱則被拋入泰晤士河中。亨利八世要世人知道：「叛徒」的下場便是如此！

¹⁷ Bridgett, *Life of Blessed John Fisher*, p.290.

¹⁸ 雖然有人認為這是教廷藉此給予費雪支持，但依當時亨利八世的心境與作為，此舉只會激怒國王，進一步坐實了費雪「叛國」的指控，教廷不可能不瞭解這樣的可能。在「可能危及費雪安全」的情況下，教皇仍執意如此做，顯然，教廷的利益考量已超越費雪本身的安危。

¹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876.

²⁰ Fisher, *English Works of John Fisher*, p.13.

²¹ 「聖帶」係指神職人員披在肩上的黑色帶子。

²² Fisher, *English Works of John Fisher*, p.14.

費雪的死引起極大的震撼與回響：一位備受敬重的神職人員與知識菁英，在風燭老病之年，不僅被沒收財產，在條件惡劣的牢獄拘禁逾年，甚至在臨終前，連基本的基督徒儀式也未獲舉行。撇開費雪與都鐸家的深厚淵源不談，就以他和亨利八世間曾有過的師生情誼，亨利對待「異議菁英」的嚴峻手法，確是殘酷無情。

費雪的殉難值得記錄，但同樣值得關注的是費雪內心的想法：從都鐸家最信任的教會人士，到與國王分道揚鑣，走上刑臺的殉難菁英，費雪究竟走過怎樣的心路歷程？他的內心有過怎樣的盤算掙扎？要釐清此點，我們必須提起費雪生命中一段重大的密謀——他曾希望查理五世介入英格蘭的內政，並不惜支持查理以軍事行動，「撥亂反正」！²³

費雪的「計畫」進行得相當隱祕，大約未向任何英格蘭友人提及，因為在其私人信件中沒有任何訊息可循。我們唯有在喬比寫給查理五世的例行報告中獲得線索，不過內容仍相當隱微。喬比最早是在 1531 年初向查理五世提及他與費雪的接觸：「羅徹斯特主教最近派人告訴我，國王又再嘗試收買他以及其他支持王后的人，跟他說了許多愚昧與謬誤的謊言。」費雪向喬比求證，由亨利處傳來「查理五世與教皇不合」的傳言是否屬實。²⁴在此之後，雙方由於支持凱撒琳的立場接近，互動遂趨密切。到了 1532 年年初，費雪與喬比間已建立起隱密的溝通管道。喬比向查理五世報告：

已經與羅徹斯特主教溝通過皇帝信裡面的命令。是透過第三者，因為沒有與他交談的機會。他派人告訴喬比，當兩人碰面時，喬比別特別注意他，直到時機好轉。有個與他溝通的安全管道，確信他持有善意。²⁵

費雪與查理五世方面達成的默契為何，到此時仍然隱晦。只能說，情勢不斷向葆琳方面傾斜，促使費雪與西班牙的聯繫日益緊密。

費雪「善意」的內容終於在 1533 年 9 月的信件中得到具體的解答。伊莉莎白公主在 9 月誕生，凱撒琳的處境變得微妙：一方面，安·葆琳生下公主讓瑪麗公主身為唯一王嗣的地位受到動搖。但另一方面，葆琳生下「女」嗣，讓亨利國王大失

²³ J.J. Scarisbrick 對此事有相當深入的見解。見 J.J. Scarisbrick, "Fisher, Henry VIII and the Reformation Crisis," in Brendan Bradshaw and Eamon Duffy (eds.), *Humanism, Reform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Career of Bishop John Fis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56-157.

²⁴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5, no.62.

²⁵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5, no.707.

所望，他對葆琳的熱情有消退的跡象，反轉情勢的機會隱約浮現。在這樣的情境下，費雪積極希望查理五世採取行動。喬比寫道：

虔誠的羅徹斯特主教派人通知我，要教皇發動戰爭來對付這些頑強傢伙的機會渺茫。陛下您必得插手，您的作為將和對抗土耳其人一樣地取悅上帝。如果事情走上決裂，那麼陛下您動用所有資源，扶植公主〔指瑪麗公主〕的女伴——「克拉倫斯公爵之女」——的兒子為國王，也不算錯估局勢。許多人認為，這個國家應該屬於他。這位「兒子」目前在帕度亞（Padua）讀書。²⁶

喬比的報告有些出人意外：費雪因為教廷無法有效行動而感到失望（其實西班牙方面亦有同感），他希望查理五世強勢扭轉情勢，即使公開對抗亦在所不惜。費雪甚至設想了取代的國王人選。這位「克拉倫斯公爵」的外孫，便是我們下一節要討論的菁英一波爾。費雪提議，可以讓瑪麗公主與波爾成婚，強化兩人的統治基礎。他確曾動過顛覆之心。²⁷

軍事行動茲事體大，尤其查理五世正面臨著土耳其勢力的步步進逼，情勢緊張。查理終於沒有公開介入英格蘭事務，費雪的期望也最後落空：亨利八世依然「如期推動」他脫離羅馬教廷的計畫。費雪與都鐸王室的關係緊密，但他同時對宗教信念極為堅持。我們該如何理解從「侍奉國王」到「顛覆國王」的費雪？「忠君」與「虔信」兩種價值在費雪的心中究竟怎樣衡量？英格蘭人文主義專家道林教授（Maria Dowling）的看法或許值得參考。她認為：

在此事〔指亨利八世的離婚官司〕之前，費雪對亨利的忠誠絕對無庸置疑；但他與國王間的歧異，使他選擇反對立場，最終走上公然的背叛。對費雪而言，關鍵問題是教皇權威、天主教世界的團結、婚姻的神聖性，以及一旦走上分裂，亨利與其子民靈魂的命運。²⁸

道林的這段評論意在說明費雪於離婚問題上採取反對立場的原因。她認為對費雪而言，離婚牽涉的不僅是國王私人的感情問題，它還觸及教皇赦免特權（*indulgence*）等宗教議題。國王離婚不但破壞「婚約」的神聖性，也傷害英格蘭與教廷間的聯繫，造成分裂。失去「正統教會」的協助，英格蘭國王與臣民如何獲

²⁶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164. 亦可見 no.1249.

²⁷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6, no.1164.

²⁸ Dowling, *Fisher of Men*, p.132.

得生命的救贖？他們的靈魂該何去何從？這些問題讓費雪憂心。道林的評論相當中肯。費雪確實在事件發微之初，便已預料到後續的發展（事實也證明，費雪的所期不差）。他在婚姻事件所持的堅持態度，並不只出於固執的宗教信念，它同時包含了「忠君」與「虔信」的兩項考量。

費雪的詳細思考我們已無從得知，因為事涉敏感，費雪怕牽累無辜，因此將所有相關信件都予以銷毀。所幸，「殉道菁英」的思維，我們仍能從與費雪遭遇雷同的摩爾身上尋得答案。費雪與摩爾先後被下入倫敦塔監獄，兩人在獄中曾互通訊息，詢問對方給予國王的答覆。²⁹從兩人供稱的通信內容，再參照摩爾在獄中寫給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 Roper, 1505-1544）的家書，我們得以探尋殉道菁英內心的矛盾與抉擇。

摩爾入獄後，亨利八世動員許多親友前來勸說。摩爾心意已定，但為免牽累無辜，他堅決保持沉默，不與任何人討論內心的想法（他的說辭是：信仰乃個人獨立的選擇，他只求誠實面對自己的良知）。³⁰但因奉命前來勸說的瑪格麗特已懷有身孕，摩爾擔心她憂心過度影響健康，於是破例透過家書，向她詳述自己內心的想法。摩爾雖然無法改變決定，但他希望透過剖白，讓瑪格麗特能夠理解，進而釋懷。這是父親對女兒的最後關懷。³¹摩爾在信中向瑪格麗特表示：

他是國王忠誠的臣子與祈福人(bedsman)，為他以及整個國家祈禱；他不做任何事，說任何話，心懷任何傷人的想法，只祈望大家都好。如果這麼做不足以留住一個人的性命，那他也不渴望苟延存活。（他）早已瀕臨死亡；從他來到這裡以後，有好幾次，他都以為會在片刻間死去，但從未因此感到悲傷，反而是在痛苦過去時，感覺遺憾。因此，他微賤的身軀任憑國王處置，希望他的死能為他帶來好處……接下來的事就交給上帝。他向上帝祈求，將祂所意願之事放置於國王心中。摩爾心裡掛懷的只是靈魂，對於肉體他並無繫念。³²

摩爾對瑪格麗特說：「他一直以來問心無愧；他首先侍奉上帝，其次侍奉國王。」³³摩爾的表白令人動容。他雖然違抗國王，但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對國王及國家的忠

²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s.856, 859, 867.

³⁰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867.

³¹ 摩爾與瑪格麗特父女情深。摩爾被處決後，他的頭顱循例應被拋棄在泰晤士河（費雪便是如此）。瑪格麗特祕密行賄獄吏，將頭顱帶回收藏。摩爾的頭顱最後與瑪格麗特的夫婿葬在一起。

³²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659.

³³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815.

誠情感。「首先侍奉上帝，其次侍奉國王」，這或許是所有選擇的答案。對於「殉道菁英」摩爾而言，反對國王不代表拋下「忠君」信念。只是，「忠君」與「虔信」有明確的先後順序；在「虔信」的信念面前，「忠君」價值只能退居次位。

從費雪到摩爾的例子，我們得到這樣的結論：對殉道菁英而言，「忠君」與「虔信」價值同時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扮演不同的份量。以凱撒琳的離婚官司為例，摩爾認為此事與「虔信」的關聯尚少，侍奉國王是優先的選擇；他雖然不支持葆琳為后，但君命難違，只能以國王的意志作為臣子的行事準則。相較之下，處事嚴格的費雪便堅持許多。可以說，從頭到尾，他都不曾隱藏反對離婚案的立場。然而，費雪如此堅持並非意圖違逆國王，而是因為他認為離婚案涉及教皇地位等根本問題。在「異端」盛行的時刻（路德剛公開挑戰教廷權威），宗教議題絲毫不能讓步：這不僅是個人的信仰選擇，它還關係著國王與英格蘭人民的靈魂救贖。費雪相信，真正重要的是靈魂的永生，而不是此世的生命。也因此，他願意傾一切可能（包括犧牲自己的生命），換取英格蘭君民的救贖。可以說，乍看之下有「叛國」意圖的費雪，是將「忠君」的信念（拯救亨利的靈魂）置放在「虔信」的框架下完成。

費雪與摩爾在個別事件中的選擇或許不同，但同樣身為「殉道」菁英，他們捍衛「虔信」價值的立場卻同樣堅決：涉及信仰的根本問題，即使失去生命，也不能妥協。如果政治讓步是為了成就「君臣之義」，那麼殉難犧牲就是為了保全「宗教良知」。無論如何，「虔信」價值在殉難菁英的心中都佔有不可撼動的首要地位。費雪與摩爾分別以自己的方式，實踐他們的「忠君」理念。但當「忠君」與「虔信」不可兩全之時，「殉難」便成為「虔信」菁英唯一的選擇。

二、流亡的菁英

這可能嗎？你怎能殺死這樣的人？他們的清白、美德，與學識，過去在你自己以及所有人的心中獲有最高的敬意。而這麼做的理由僅是因為他們不肯違背良知，贊同你那褻瀆上帝的法律…你怎能殺死費雪？你怎能殺死摩爾？你怎能犯下這樣的罪行，墮落至此？我不在現場，但每每想起此事，它便像場可怕的惡夢，而告知我此事的人，像是在敘述夢境。即使是基督徒的公敵尼祿(Nero)與

多米提安(Domitian)，³⁴他們如果與你同樣地認識他們〔指費雪與摩爾〕，也不可能如此殘酷地對待。我而且敢發誓，路德本人如果身處你的位置，擔任英格蘭國王，即使他們兩人是他最可怕的敵手，也不會想到以這樣的手段來施加報復。

—《捍衛基督教會的統一》³⁵

這是費雪與摩爾被處決後，悲憤交集的波爾，在呈給亨利八世的策論《捍衛基督教會的統一》(*Pro ecclesiasticae unitate defensione*, 1536)中發表的激烈言論。波爾將亨利八世與著名的羅馬「暴君」尼祿及多米提安相提並論。他甚至宣稱，即使是立場最爲對立的路德，也不會這樣對待他的敵人。費雪與摩爾的死對當時身處義大利的波爾造成極大的衝擊。他見識了國王的性格與決心，也明白自己再沒有沉默的空間。他決定表態，最後一次力諫國王回頭，而在此同時，他也做好了長期流亡的準備。³⁶

這對於波爾並不是容易的決定，因爲他與亨利八世間有著極深的君臣恩情；亨利對波爾寄望深厚，而波爾也懷抱著深刻的忠君情懷。波爾的出身尊貴。母親瑪格麗特(Margaret, Countess of Salisbury, 1473-1541)是愛德華四世(Edward IV, r.1461-1483)的姪女，前朝金雀花王室(House of Plantagenet)的最後一系血脈。³⁷或許因爲波爾家族是都鐸王室的潛在對手，是以一直不爲亨利國王所信任。³⁸然而，亨利八世卻例外地對波爾恩遇有加。波爾從求學時代開始，就持續接受亨利八世的生活資助：他在牛津就讀時，亨利曾連續兩年賜予他十二英鎊的津貼；待他前往帕度亞求學，亨利又撥付一百英鎊的資助，還特別去信威尼斯政府，要求對他特別關

³⁴ 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r.81-96) 爲羅馬皇帝。他曾迫害基督徒，是以在基督教的傳統中評價不佳，與尼祿同爲「暴君」典型。

³⁵ 引用自 Bridgett, *Life of Blessed John Fisher*, pp.422-423.

³⁶ 學界近年來對波爾的研究以 Thomas F. Mayer 最爲重要。Mayer 是波爾的專家，除出版多本波爾的專論，也是最新出版的波爾書信集的編者。茲就他的 *Reginald Pole: Prince and Proph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書爲例略爲說明 Mayer 的研究角度。此書分析波爾的作品與寫作情境，讓讀者對波爾其人有更深入的瞭解。此書最有價值的論點是 Mayer 挑戰了傳統將波爾神聖化的歷史定位。Mayer 認爲波爾深諳馬基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的論點，並將之運用在推動英格蘭的天主教信仰上。Mayer 的研究一絲不苟，文筆稍嫌乾澀，不過他的作品是瞭解波爾不可忽略的參考著作。

³⁷ 瑪格麗特是愛德華次弟克拉倫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 1449-1478)之女。

³⁸ 從 1518 年開始，波爾家族便因爲與英格蘭最具勢力的白金漢公爵(Edward Stafford, duke of Buckingham, 1478-1521)締結聯姻，而讓亨利八世備感威脅，雙方陷入微妙的緊張關係。白金漢公爵後來在 1521 年被亨利八世處決。

照。³⁹波爾在義大利的花費也是仰賴亨利給予的教職收入。⁴⁰波爾因為亨利八世的特別照護，地位尊崇，一帆風順。

1527 年，亨利八世開始蘊釀他的離婚計畫，身處義大利的波爾很自然地為國王所差遣。他在 1529 年底奉命前往巴黎大學，尋求有利於國王離婚的神學論點。⁴¹波爾早期的傳記史家認為，波爾雖然勉力完成任務，但其實不認同國王的作為：他曾以「離婚判決的困難度與危險性」為理由，建言反對國王的計畫。然而，波爾的權威史家梅耶(Thomas Mayer)持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這些史家的結論是根據波爾日後的說詞而來；此時期的波爾係誠心為國王奔走。⁴²我們姑且不論波爾此時期的想法如何（因為沒有書信存留，無法獲知真相），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離婚案推動之初，波爾選擇站在國王身邊，供國王驅策。「忠君」價值在此時高於其他。

波爾的思想在 1532 年間出現變化。⁴³他在離婚問題上與亨利八世出現歧見；他因為不能屈從於國王的見解，還拒絕了約克大主教的職位。不過，波爾也不願意與亨利公開衝突，他於是避走他鄉，重返帕度亞求學。喬比對於當時的情況有以下的描述：

國會將在 16 日召開……幾乎所有宗教與世俗的大貴族都將出席……公主女伴的兒子(雷金納德·波爾，索爾斯堡女伯爵的兒子)，拒絕了約克大主教的職位，

³⁹ 波爾早年曾進入牛津大學求學，在那裡受到李納克爾(Thomas Linacre, 1460-1524)與拉蒂默(William Latimer, c.1460-c.1545)等著名人文學者的啟發，他於是在 1521 年前往義大利的帕度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dua)繼續求學。Thomas F. Mayer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 vol.1: A Calendar, 1518-1546: Beginnings to Legate of Viterbo* (Aldershot: Ashgate, 2002), p.41 n.10. 因為亨利八世的關照，出身高貴的波爾在帕度亞備受禮遇：除了住進豪華御所，得到配劍上街的特許，威尼斯政府還特別指定當時已屆六十五歲高齡的雷歐尼可(Niccolò Leonico Tomeo, c.1456?-1531)，擔任波爾的老師。Mayer, *The 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 pp.40-42. Cardinal Gasquet, *Cardinal Pole and His Early Friend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27), pp.18-20.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 no.4190; vol.2:2, p.1455; vol.3:1, no.198.

⁴⁰ T.F. Mayer, "Pole, Reginald (1500-1558)", *DNB*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2456, accessed 17 May 2010]。波爾在一五二六年取得 South Harting (Sussex) 的聖俸(living)；1527 年取得約克大主教區的教職；同年又獲得 Exeter 大教堂的教士俸(canonry)(7 月 25 日)。四天後，他被選為首席司祭(dean)。

⁴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4:3, nos.6003, 6004, 6383, 6394, 6505. 教皇曾試圖壓制簽署支持亨利八世的行動，見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4:3, no.6403. 波爾在 1530 年夏天完成使命，返回英格蘭。他在英格蘭期間，開始跟隨 Robert Wakefield 學習希臘文。依據 Mayer 的判斷，這是波爾接觸神學的開始。也是在此契機下，波爾逐漸離開了亨利八世的思維。Mayer, "Pole, Reginald (1500-1558)", *DNB*.

⁴² Mayer 認為，若非如此，則波爾應該難逃與其他十五名教會人士一同被罷黜教職的命運。見 Mayer, "Pole, Reginald (1500-1558)", *DNB*。

⁴³ 有一種說法是，波爾因為替亨利搜集神學意見，遂開始對宗教理論感到興趣。

因為他不願意採納國王的論點，一直到最近才獲得出國求學的許可。他告訴國王，如果他留在國內，就必須出席國會。而如果離婚問題被提出來討論，他就必須依其良知發言。基於此點，國王立即允許他的離境，並且承諾繼續供給他四百杜卡幣(ducats)的收入，保有他的聖俸。⁴⁴

波爾返回義大利後，專心投入他深感興趣的神學議題，不對英格蘭的事務發表意見。⁴⁵

然而，1534 年時，局勢出現重大轉折。亨利八世強勢要求知識菁英表態，波爾與亨利的關係面臨挑戰。波爾是「海外學人」的意見領袖，留學生經常出入他的家宅聚會，他的公開支持對於亨利至為重要。然而，波爾早在 1532 年便對離婚案持反對想法，經過兩年的神學浸淫，他的立場更趨堅定。面對亨利的壓力，波爾非常掙扎：他無法蒙蔽良知，又不願意違逆國王。他唯一能做的是「爭取緘默的空間」，他希望透過「不表態」，來避免內心價值的衝突。

1535 年，英格蘭的局勢益發險峻，反對國王的團體或個人都遭到嚴厲的懲處，費雪與摩爾相繼殉道。這帶給波爾很大的刺激；他體會到閃避是懦弱的表現，這樣做只會讓情勢更為惡劣，讓國王越走極端。他決定打破沉默，上書國王，說明他的心路轉折與決定：

我的內心經歷了不可思議的轉變。到目前為止，我一直保持沉默，心懷恐懼；現在，我要勇敢地說出來。我要說出曾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上帝為證，我句句屬實。我剛聽聞這場殺戮時，⁴⁶整整一個月，我的人驚呆了，發不出聲音，因為這前所未見的舉措，聞所未聞的酷行。待我恢復過來，心智與他們〔指費雪與摩爾〕一樣清明後，我決定不再像以前那樣，只在友人的耳畔低聲私語我的想法，而是要以基督的言辭，從屋頂上鼓吹、宣揚。⁴⁷

波爾的表白很令人動容。他說出自己曾有過的恐懼、掙扎，也道出費雪及摩爾的殉道為他帶來的巨大衝擊。最後，他告知亨利他不再沉默，要將真正的信念宣揚

⁴⁴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5, no.737.

⁴⁵ Mayer, "Pole, Reginald (1500-1558)", *DNB*. 他的友人與首位傳記作者，拉克薩大主教貝卡德里(Ludovico Beccadelli, Archbishop of Ragusa, 1501-1572)曾這樣描述：波爾自 1532 年從英格蘭返回帕度亞後，便「強烈轉向神學研究」。Jonathan Woolfson, *Padua and the Tudors: English Students in Italy, 1485-1603*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Ltd, 1998), p.112.

⁴⁶ 指亨利八世處決費雪與摩爾之舉。

⁴⁷ *Pro ecclesiasticae unitate defensione*, lib. Iii. 引用自 Bridgett, *Life of Blessed John Fisher*, p.424.

出來。波爾所經歷的是亨利朝菁英（或者平民百姓亦然）的共同經驗：來自國王的龐大恐懼與壓力，以及內心劇烈的交戰與掙扎。波爾與費雪及摩爾不同的是，他決定離開英格蘭：他不選擇殉道，他選擇流亡。他決定留在歐陸奔走，傾力讓「英格蘭（如果不是亨利國王）」『回歸正途』。」

「流亡」是個痛苦的決定，因為亨利為確保波爾的支持，動用所有管道，向他恩威並施。波爾的決定不僅關係著個人理念，還牽扯到他留在英格蘭的親人朋友，尤其是她年邁的母親。「流亡菁英」波爾的遭遇讓我們見識到亨利八世的強悍手段，而波爾的心路掙扎，也反映了亨利朝菁英的艱難處境：「忠君」與「虔信」價值再次衝突。

亨利八世對波爾的「遊說」從 1535 年初便已展開。最早被交付這項任務的是波爾在帕度亞的親近友人史塔基（Thomas Starkey, c.1495-1538）。⁴⁸史塔基剛結束學業返回英格蘭發展。亨利八世責成他取得波爾對「國王至高權」等問題的「正面」意見。史塔基多次去信波爾，字裡行間處處透露他承受了龐大的壓力。他勸波爾要「審慎考慮以下的話，因為它們牽涉到你整個的人生，以及在這個國家中你所愛的親人及朋友。」⁴⁹他建議波爾「仔細參考『利未律法』（Levitical law）」，以其為根據思考國王的婚姻問題；依據《舊約聖經》「利未記」中的經文，亨利八世與凱撒琳的婚姻沒有效力。⁵⁰

除了史塔基之外，波爾在義大利的英籍友人也被動員加入勸說的行列：他在威尼斯的舊遊哈維爾（Edmund Harvel, d.c.1550）便在指示之下，造訪波爾，促其表態。⁵¹連波爾的親信僕人思羅克莫頓（Michael Throckmorton, d.1558），也一度為克

⁴⁸ 史塔基出身於赤郡(cheshire)的中等家庭，父親曾出任威爾斯公職，因此在地方上頗有聲名。他在 1516 年畢業於牛津大學的「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在那裡，史塔基結識了許多同好，包括有自然科學家渥敦(Edward Wotton, 1492-1555)、人文學者路普塞(Thomas Lupset, c.1498-1530)，以及對他一生影響極為深遠的友人兼贊助者—波爾。史塔基在 1523 年與路普塞一同追隨波爾的腳步，前往帕度亞求學。他在那裡與波爾益為親近，不僅擔任波爾的私人祕書，還陪伴他出使各地。透過波爾，史塔基與許多重量級人士建立起不錯的交情。

⁴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218. 史塔基之後又多次去信波爾勸說，參見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s. 219, 801, 1156.

⁵⁰ 「利未律法」指的是《舊約》「利未記」中的經文。不久之後，克倫威爾也寫了一封信給波爾，「希望波爾能運用他的學識與判斷力，回答史塔基信中所提出的問題。」克倫威爾顯然讀過史塔基的去信。*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220.

⁵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535. 克倫威爾似乎是透過史塔基，以「邀請哈維爾回英發展」為酬，要他在波爾表態一事上使力。*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579. 亦參見 no.672. 哈維爾此時期與史塔基通信的重點之一是「報告」波爾的近況。

倫威爾所接觸，遊說他改投旗下。⁵²英格蘭的海外學子大多經濟困窘，並且期待回國發展，是以國王在此有很大的著力空間。長期旅居帕度亞的波爾非常瞭解留學生內心的難處（波爾本身便常資助他們），舊遊的勸說讓他承受很大的壓力。他坦誠布公的商議對象，逐漸從原本的英格蘭舊友，轉變為他在義大利結識的天主教會友人。

交遊的轉變顯示波爾意向的轉折。波爾在寫給威尼斯友人皮烏里(Alvise Priuli)的信中透露了他的為難。⁵³波爾表示，他已「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基督的意志，藉此機會，闡揚上帝的榮耀。然而，必須小心行事。」⁵⁴這封信顯示波爾對皮烏里的信任，但信中「小心行事」的字眼也表示他的宗教見解高度敏感。令人不無傷感的是，波爾因為立場不同，不得不與故國摯友們分道揚鑣。

波爾心中有了與國王決裂的打算，但他還希望多做努力。1535年10月，他從帕度亞寫信給克倫威爾，請求他向國王轉達自己的心意。波爾知道自己的意見不為國王所喜，但仍竭盡所能透過各種管道向亨利八世建言。他的信中流露深厚的「忠君」情懷：他對於亨利八世的栽培之恩，一直銘記於心。

我請求你[指克倫威爾]能給我一個更大的恩惠，替我向陛下保證，我隨時準備供他驅使；因為我認為我所擁有的任何美善，除了來自上帝，均得自陛下他在我接受教育的過程中所施予的慷慨；我以為，我在此處的獲益，超過國王曾賜與其他人的所有提拔。⁵⁵

然而，波爾的溝通並未獲得成果。亨利八世仍持續施壓，要求他就「迎娶兄長遺孀是否合法」以及「羅馬教廷是否神聖」等問題明確表態。波爾最後提筆回應，完成了1536年5月出爐的策論－《捍衛基督教會的統一》。這本策論的內容與結果我們已在前面約略提及，我們在此關注的因此是波爾撰寫此書前後的心路抉擇。波爾已經決定，國王倘若不願回頭，他將尋求外界力量來「拯救英格蘭」。他不會與費雪及摩爾一樣，奉召回國，入獄殞身來完成君臣之義，因為這樣不能阻止國王朝「錯誤的道路」繼續前進。他要盡力阻止國王步上歧途，即使被冠上「叛徒」之名

⁵²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536. 思羅克莫頓是波爾的親信僕人。波爾《捍衛基督教會的統一》的初稿便是交付給他，由他送回英格蘭呈給亨利八世過目。此行相當驚險，思羅克莫頓差點無法脫身，安全返回帕度亞（他以「負責傳達國王的意思給波爾」為由，才得以順利離開英格蘭）。

⁵³ 皮烏里出身威尼斯銀行世家，兄長曾擔任威尼斯總督(doge)，兩人常分享宗教經驗。

⁵⁴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8, no.762.

⁵⁵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9, no.701.

亦在所不惜。他決定留在海外，「走向羅馬」。⁵⁶

波爾透過他在義大利的友人康達里尼（Gasparo Contarini，1483-1542），與羅馬教廷取得聯繫。康達里尼出身威尼斯的貴族家庭，在 1535 年時出任樞機主教，是教皇保祿三世倚重的左右手。波爾哀傷地對康達里尼表示，他「對英格蘭感到絕望」，請求康達里尼運用一切影響力，「協助羔羊，迷途知返！」⁵⁷康達里尼於是積極安排波爾前往羅馬，以便借重教廷的力量，達成波爾解救祖國的希望。⁵⁸

然而，在此同時，波爾仍未放棄向亨利八世表明心跡。他在 7 月 15 日自威尼斯寫了一封長信給亨利國王，向他說明不回英格蘭的決定，力勸國王回頭。波爾表示，「原本招致的恥辱」，將因「迷途知返，轉化成更大的榮光。」

關於解說這本書（《捍衛基督教會的統一》）……要理解此書，必得貫徹地讀。在某些段落，作者可能看起來像是國王最大的敵人；然而，把段落放在一起閱讀便會知曉，尖銳的安排係出自最親愛的目的；沒有一本書，裡面包含比此書更尖銳的文字，以及更炙熱的愛。「我一直以來所盼望的是陛下您能在榮譽、富裕、安全，以及眾人的愛與敬仰下，長久地治理國家。」⁵⁹

波爾提醒亨利，他的聲譽已嚴重受損，唯一的補救之道是重返天主教會門下。他以睿智聞名的所羅門王（King Solomon）為例，說明英明如所羅門王，亦曾因「過度鍾愛女性」而誤入歧途。他今日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提點國王。國王身邊缺少直諫的臣子；一味替國王辯護只是陷國王於不義。波爾相當感性地說：

誰會告知他[指亨利八世]他的錯誤？而即使能找到這樣的人，又到哪裡去尋得願意傾聽的國王？然而，上帝已賜給國王這樣一位忠誠的臣子，他身處安全之境，並且因國王敦促他發表意見，而有了暢所欲言的機會。⁶⁰

波爾將自己比喻為一位外科醫生。當外科醫生「依據他的訓練，取出他的手術刀，割除壞死無用的皮肉時，怎不讓傷者陷入瘋狂，大聲呼喊他〔外科醫生〕為敵人。」然而，眾所周知，外科醫生的所為不是要與病人為敵，而是要為他的健康盡

⁵⁶ 亨利八世讀過波爾的策論後表示，他與波爾間有很深的誤會，希望波爾返英釐清。亨利此舉自是為了「誘騙」波爾回國。波爾滯外不歸，為亨利八世帶來威脅。

⁵⁷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0, nos.1093, 1097.

⁵⁸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71.

⁵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1.

⁶⁰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1.

份心力。⁶¹波爾最後表示，上帝已讓情勢有所轉變：安·葆琳已被斬首，造成此番混亂的原因已經消失。⁶²亨利八世可順理成章回歸教會，重返正途。⁶³

波爾的這封信文情並茂，不僅說之以理，且動之以情，字裡行間流露出他力挽狂瀾的企圖。他雖然對亨利八世深感失望，卻不願放棄最後規勸國王的機會。波爾已經選擇了「虔信」，但他尚未放棄「忠君」的可能！

波爾在給亨利八世寫信的同一天（1536 年 7 月 15 日），也同時寫了一封信給母親。信中親子真情流露，波爾有與母親訣別的意味。他向母親表達自己全心侍奉上帝的決心，希望她理解自己的決定，並且請求母親不必為他掛念，將一切都交付給上帝。

（我）最謙卑地祝福您一切安好。夫人，我清楚夫人您一直期盼我返家，尤其在此時刻，強烈希望在幾天之內，您便能立即見到我…現在，我無法依您的期望回返，而且，我知道您會對我的未歸感到悲傷與驚訝…您曾將我全然地奉獻給上帝…是以，如您願意與我分享上帝所賜予我的安慰，則最合宜的方式，便是將所有對我的掛慮拋開，讓我與我主同在。我的意思是，不要花費絲毫心思在我身上，因為您明瞭，您為我找到的是怎樣的一位主人。至於您自身以及我，我相信您會把一切都交託給祂的仁慈，而這將成為我自您那裡得到的最大安慰。⁶⁴

波爾在寄送家書後不久（18 日），便接到康達里尼的來信，通知他教皇急欲召見。⁶⁵他於是在 27 日寫了一封信給教皇，表明奉召，但也同時說明，「辜負亨利國王」讓他內心不安，希望教皇能透過宗教會議的舉行，讓英格蘭重返羅馬懷抱。

收到教皇的來信…很高興得知他〔指教皇〕當務之急是要召開宗教會議。樂意竭盡所能地配合…然而，內心相當不平靜，唯恐此舉將觸怒國王。對國王，他欠負著諸多恩惠，雖然站在一位堅定捍衛教會者的立場，他〔指亨利八世〕已背離了教會。但不管別人如何，仍無法對亨利全然絕望。祈望能在宗教會議中，

⁶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1.

⁶² 葆琳在 1536 年 5 月 19 日，被亨利八世以通姦的罪名處決。

⁶³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1.

⁶⁴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2. 波爾的母親不久便回覆一封信，信中持續以母親的柔情勸說波爾，訴說亨利國王對她以及波爾手足的照顧，提醒波爾亨利國王一直以來對他的深恩厚愛。*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93.

⁶⁵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115.

挽回英格蘭。⁶⁶

波爾決定前往羅馬的消息很快傳入亨利八世的耳中。他動用所有管道，力阻波爾成行。波爾在帕度亞的舊遊都奉命勸阻。⁶⁷銜命勸說者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波爾的長兄蒙塔古大人(Lord Montague)—亨利·波爾(Henry Pole, c.1492-1539)。蒙塔古在9月13日寫信給波爾，提醒他整個家族的命運掌握在國王手中：

近來曾與國王交談，他誦讀了你書中相當多的內容，「這讓我深感悲痛，即使我失去了母親、妻子，與兒女，亦不過如此……你如此不近情理地對待這般高貴的國王；你無法否認，除了上帝，你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他。此外，他提拔我們這個被徹底踐踏的家族，晉升至高貴，展現了他的寬厚、他的仁慈、以及他的憐憫。

(我)見你有一天將會恩將仇報，或視你自身的判斷力超越所有國人，這令我感到悲傷…你如果還通情達理，現在就該迷途知返。如此，則我們能將一切視為神的意志，透過你的負恩來展現國王的逆來順受。他〔指亨利八世〕堅韌地忍受你的詆毀，這已超過這個國家最卑微者之所能……因此，親愛的雷金納德，拋開你心中的諸多顧慮，讓我們……依我們不可推卻的職責，一同侍奉他吧。⁶⁸

蒙塔古最後在信中極力勸阻波爾前往羅馬：

我感到不可思議，你會因為羅馬主教寫給你的一封短信，便決定今年冬天與他為伴。你如果這樣做，則我所有的希望都破滅了……然而，我終究無法完全絕望，無法相信你的盲目會如此地觸怒上帝，以致失去這般高貴君主、你的祖國，以及整個家族的眷顧。⁶⁹

蒙塔古的信乍看之下與其他人的書信沒有太大的差別，然而，他在開頭便「婉轉」提及，他是在克倫威爾的「善意提醒」下完成此信。⁷⁰蒙塔古雖未明言，但顯

⁶⁶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173. 波爾此時的心情亦可從他在8月10日寫給維農娜主教(Bishop of Verona)吉伯提(Gian Matteo Giberti, 1495-1543)的信中看出；他在信中表示教皇打算召開大公會議(General Council)，他既奉召，就只能前往。*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269.

⁶⁷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s.401, 402.

⁶⁸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451.

⁶⁹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451.

⁷⁰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451.

然暗示波爾，整個家族都在亨利八世的嚴格監控中。⁷¹

「家人安危」是波爾沉重的煎熬與考驗。他面對的不僅是個人的良知，還有親人的性命。在親情的壓力下，他曾一度考慮退縮。他在 10 月 10 日寫給康達里尼的信中，披露了自己的心情：

近來收到許多來自英格蘭關於國王處置我的信件。信件越頻繁、越駭人，我就越得將安危全然託付給教皇……國王必然認為這些信能阻止我前往羅馬。他是對的，然而神的恩典讓我堅持我的決定。這些來信，一封是來自克倫威爾，以國王的名義寫成，裡面充滿了各種威嚇。第二封來自滕斯托爾（Tunstal），他長篇大論，試圖引用《聖經》的權威論證，與教皇的徵召相比，我更有義務遵從國王的傳喚。⁷²第三封信深深地打動我，來自我的母親與兄長。他們在如此悲慘的沉重壓力下提筆，閱讀他們的來信，我幾乎屈服了。我真的開始改變計畫，他們是如此殷切地懇求我不要進行這趟忤逆國王的行程，否則將與我斷絕血源關係。我不知道該如何避開這項針對我要害而來的打擊，除非更改計畫，我於是想請求教皇的仁慈許可。然而，我被兩位傑出的主教勸阻了……他們說，我的堅忍不拔，將更彰顯基督的榮光，當國王的脅迫與親人的慈愛都不能使我動搖之時。⁷³

終於，波爾決定捨棄一切，將命運付託給上帝。1536 年 12 月 22 日，波爾在羅馬接受教皇的正式冊封，成為樞機主教。他的任務是「盡一切可能，讓英格蘭重返天主教會！」⁷⁴

波爾從「信服國王」、「規勸國王」，至公然「反對國王」，走過了一段艱辛的歷程。波爾的書信顯示，他未曾或忘亨利八世曾賜予他的知遇之恩；他試圖結合「虔信」與「忠君」兩種價值。只是，他區別出「忠君」與「服從」之間的差別：他捨棄了以「服從國王的命令」為內涵的「忠君」解釋。他將「忠君」定位為「力勸國王回歸正途」。然後，在勢不可為之時，將「忠於國王」昇華為「忠於國家」，不惜

⁷¹ 事實證明，在波爾拒絕回英後，他的家族在英格蘭遭受亨利八世嚴厲的報復：蒙塔古本人在 1539 年被以「叛國罪」處決，其家產也被沒入。他的母親則在 1541 年被亨利八世處死。

⁷² 滕斯托爾（Cuthbert Tunstal, 1474-1559）是波爾敬重的學界友人。他曾任倫敦主教等重要教職。原本在離婚議題上，滕斯托爾與摩爾等人站在同樣的立場，但因為來自亨利八世的龐大壓力，滕斯托爾最後選擇屈服。

⁷³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654.

⁷⁴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11, no.1353.

化身為外人的棋子，換取英格蘭的「回歸正途」。波爾一直是歷史上評價正面的人物。當代人稱他「才德兼備」。1536年之後，波爾在亨利政府的官方文書中被定位為「叛徒波爾」(traitor Pole)。然而，波爾背叛的是亨利國王，不是英格蘭王國。經歷了抉擇的歷程，波爾區別了「國王」與「國家」。他試圖「顛覆國王」，卻不曾「背叛國家」。波爾的選擇展現了知識菁英另一番的掙扎與執著。波爾雖然沒有像殉道的摩爾等人如此地讓人歎歎傳頌，但他獲得的正面評價，亦可視為青史還予他的公正報償。

三、屈服的菁英

在所有亨利朝的知識菁英中，最易為人所忽略的是第三類——「屈服的菁英」。他們沒有像摩爾、費雪那般引人矚目，也沒有像波爾一樣揚名立萬。他們不是「聖人」，⁷⁵沒有為理念違抗國王；他們被歷史的洪流所淹沒。然而，就本文的中心關懷來看，這群「被淹沒」的「屈服菁英」特別值得探討。他們與亨利八世一手提拔的宗教改革推手（如克倫威爾、克蘭默等人）不同。⁷⁶他們接受過良好的人文主義與神學教育，對於局勢有優越的判斷能力。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懷抱著理念；他們絕大多數不認同亨利八世的激烈作為，但他們最後都選擇了屈從。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他們擁有知識，擁有判斷力，為什麼還選擇屈服？是出於政治壓力，還是價值選擇？這群菁英的思維或許最能代表，也最足以說明「知識菁英未能阻止亨利八世推動宗教改革」的原因。

在所有屈服的菁英中，我們要討論的史蒂芬·加德納（Stephen Gardiner，1482-1555）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加德納的出線主要基於幾項理由：首先，他在當代是與摩爾、波爾等人齊名的人物。他們的養成背景接近，出仕後互動密切，同屬一

⁷⁵ 這是 Redworth 對其主人公加德納的注腳。Glyn Redworth,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The Life of Stephen Gardin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2.

⁷⁶ Diarmaid MacCulloch 寫過一篇文章比較加德納與克蘭默，詳細說明兩人在不同階段的養成與思維，值得參考。不過，MacCulloch 是研究克蘭默的專家，他在心境上不免對克蘭默懷抱著「同情的理解」。Diarmaid MacCulloch, "Two Dons in Politics: Thomas Cranmer and Stephen Gardiner, 1503-1533,"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7:1 (March 1994), pp.1-22. 關於克蘭默可見 Diarmaid MacCulloch, *Thomas Cranmer: A Lif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個文人圈。⁷⁷其次，加德納活躍的時期甚久：他在瑪麗朝中期過世，服侍過多位都鐸君主，也親身走過宗教改革後英格蘭教會於「新教」(Protestant)與「天主教」間的劇烈震盪。加德納在愛德華六世乃至瑪麗時代的作為，有助於我們釐清他真實的信念，對他在亨利朝的選擇做出更準確的論定。最後一項則是學術史的理由。加德納受到的學界關注相當稀少。穆勒(James Muller)在1926年的作品《史蒂芬·加德納與都鐸朝的反動》仍是相關研究的經典。⁷⁸而最近一本以他為主題的論著《捍衛天主教會：史蒂芬·加德納的一生》也已經有二十年的歷史。⁷⁹「二戰學者」穆勒的學術紮實，以闡述加德納的生命全貌為目標，雖然論點四平八穩，但缺少清楚的問題意識與切入觀點。可以說，在亨利朝相當重要的加德納，因為缺少「特出的氣節」與戲劇化的生命歷程，幾乎為學界所徹底遺忘。然而，「平凡」的加德納真的不值得關注嗎？本文認為，正因為加德納「平凡」，所以更值得探討，因為他代表的正是絕大多數面對亨利八世的強勢作為，無能為力的「平凡」英格蘭子民。如果連受過良好教育，享有政治資源與社會聲望的加德納都「無力回天」，一般的平民百姓又如何阻擋國王的堅決意志？在某個程度上，亨利朝宗教改革之所以成功，答案就落在加德納的身上。

加德納出身富裕的布商家庭，自幼便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後來進入劍橋大學就讀，在古典學上表現優異。加德納的興趣後來轉向法律，他在1520-21年間，先後獲得民法(civil law)與教會法(canon law)兩個學位。加德納初露頭角是在1525年。他受到當時的首席大臣「烏爾西樞機主教」(Cardinal Thomas Wolsey, 1475?-1530)賞識，進入他的家宅服務。加德納在外交上具有長才，多次負責外交任務。離婚案浮上檯面後，亨利八世亟需對外交涉的人才，加德納遂獲得重用。⁸⁰加德納在國王的離婚事件中全然支持亨利的立場，自此仕途一帆風順。他先是被提拔在國王的身邊擔任祕書，接著被派任到英格蘭的古老主教區——「溫徹斯特」(Winchester)——擔任主教。依加德納的資歷，這是國王給予的優厚報償。

⁷⁷ 舉例來說，加德納曾與摩爾一同出使法國。

⁷⁸ James Arthur Muller, *Stephen Gardiner and the Tudor Reaction*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6).

⁷⁹ Redworth,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⁸⁰ 1527年，加德納和摩爾一同代表英格蘭，與法國簽署共同對抗查理五世的盟約。英格蘭此舉意在借助法國的力量，「解救」當時為查理五世困在羅馬的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 r.1523-1534)。亦即，亨利八世企圖透過教廷，取得與凱撒琳解除婚姻關係的許可。

加德納在歷史上的評價相當分歧。知名的新教作家福克斯（John Foxe，1517-1587）稱他為「狡猾的溫徹斯特」（Wily Winchester），認為他「擁有殘酷的本性」與「不乏狡獪的機智，總是俟機阻撓真理的傳播。」瑪麗朝的新教流亡領袖波奈（John Ponet，c.1514-1556）則鉅細彌遺地描述加德納（身體上）「惡魔般」的殘疾。⁸¹當代的編年史家瑞色斯里（Charles Wriothesley，1508-1562）則喚加德納為「好主教」（good bishop），說他支持英格蘭脫離羅馬教廷一事，「功德無量」。瑞色斯里此言乃反諷之語，因為他是天主教會的支持者。⁸²

相對於都鐸朝作者對加德納的冷嘲熱諷，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顯然對他友善許多。瑞德沃斯（Glyn Redworth）這樣評論加德納：

他不是聖人。不像摩爾，他看不見傑若姆(Jerome)覺察到的真理：分裂（schism）終將走向異端(heresy)。這位熱切的年輕主教……讓自己相信，國王至高權是值得支持的目標。服從對加德納而言是一種宗教行為，更何況，唯有君王的保護，才能拯救被反教會團體與新教支持者步步進逼的教會。⁸³

瑞德沃斯認為加德納有思想上的盲點，但他立意良善：他希望透過「效忠國王」的方式來「捍衛教會」。加德納比不上殉道的摩爾與費雪，他比較「懦弱」（weaker），但他也更符合人性（human）。他是一個活在「宗教改革亂世」的平凡人，「不特別勇敢，也不全然誠實。他在判斷上出現許多失誤，但他試著同時效忠國王與他的上帝。」⁸⁴

加德納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是心機深沉的狡詐惡徒，還是亂世浮沉的平庸凡人？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拉長時間斷限，觀察他一生的作為來下評斷。加德納雖然在 1530 年代的風暴中全身而退，但他與亨利八世的重臣克倫威爾及克蘭默等人並不和睦。克蘭默以坎特伯里大主教的身份強勢介入主教權限，他的舉動引起加德納的強烈抗議。加德納的反應顯示，他雖然遵從國王自立教會的決定，但對於教會內部的大幅變革（如 1536 年的「解散修院」（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之舉）並不贊同。

⁸¹ 波奈的論點不甚公允，因為他在 1551 年取代加德納成為「溫徹斯特主教」，兩人在職位上有前後任的緊張關係。

⁸² Redworth,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p.3.

⁸³ Redworth,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p.2.

⁸⁴ Redworth,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p.3.

加德納的宗教立場在亨利八世去世後更趨明顯。亨利八世辭世時繼位的愛德華六世 (Edward VI, r.1547-1553) 只有九歲，朝政掌握在舅父「薩莫塞公爵」(Edward Seymour, Duke of Somerset, 1506-1552) 的手中。薩莫塞與愛德華一樣信仰新教，英格蘭教會遂明顯在教義上往新教方向傾斜。克蘭默因為理念接近，於是獲得薩莫塞的重用，主導教會的改革工作。加德納對於克蘭默簡化儀式內容的作法深為不滿，兩人終因 1549 年版《共同祈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 1549) 的內容，發生嚴重衝突。⁸⁵加德納最後被逮捕下獄，在倫敦塔中監禁了五年之久。

1553 年瑪麗一世即位，加德納的命運再次翻轉。瑪麗是凱撒琳的女兒，具有西班牙血統的她是位虔誠的天主教徒。瑪麗即位後的首要之務便是放棄國王「教會之首」的頭銜，帶領英格蘭重返羅馬教會的懷抱。瑪麗從倫敦塔中釋放被拘禁的前朝「異議菁英」，加德納重獲自由。加德納在瑪麗朝深受女王的信任：他不僅重返溫徹斯特主教區，還出任朝中最重要的「大法官」一職，親手在瑪麗的加冕典禮上，將王冠戴在女王的頭上。加德納在瑪麗治下擔負重任：他重新宣告瑪麗的合法繼承權利（此舉意謂「承認瑪麗之母凱撒琳與亨利八世的婚姻效力」），帶領天主教會恢復運作。加德納還公開收回他以前支持「國王至高權」的言論！

加德納在「國王至高權」的立場上出現一百八十度的反轉。他在亨利朝支持國王脫離羅馬教會，卻在愛德華時代因反對新教改革而甘心入獄。加德納的前後作為如此矛盾，我們該如何解讀？學養俱佳的加德納缺乏中心信念嗎？倘若如此，他應該不會在愛德華朝冒上生命危險，反對當道。然而，加德納若是天主教會的信奉者，又何以支持亨利八世自立為教會領袖的決定？面對「矛盾的加德納」，我們唯有從他的著作中尋找答案。

加德納在 1535 年撰寫了一本《論服從的真諦》(*De vera obedientia*) 的策論。⁸⁶此書對「服從」(obedience) 的意涵有深入的剖析，有助於我們理解他的思想。他

⁸⁵ 一五四九年的《共同祈禱書》(*Book of Common Prayer*) 中，規範國教會的儀式內容與祈禱詞。裡面的神學解釋，與保守派的加德納等人的看法不同。

⁸⁶ 此論的正式標題應為《主教論服從的真諦》(*Episcopi de vera obedientia oratio*)，不過今日多以《論服從的真諦》稱之。此作品在 1535 年完成後，隨即印刷出版。1553 年，新教神學家貝爾(John Bale, 1495-1563) 將之翻譯為英文，在漢堡(Hamburg) 出版。此譯本未經加德納本人認可，有許多的錯誤。Pierre Janelle 在 1930 年代重新整理、翻譯加德納的作品，成為最可靠的版本。Stephen Gardiner, *Obedience in Church and State: Three Political Tracts by Stephen Gardiner*, ed. and trans. by Pierre Jane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寫道：

真正的服從是服從真理。上帝就是真理。因此，真正的服從是服從上帝以及祂所指定的代理人。上帝真言所在的《聖經》認定國王是上帝在世間的代理人。我們因此應該服從國王，無論在宗教抑或世俗的事務上。這也是合乎道理的，因為組成教會的成員，同時組成了國家；否定國王在一個領域內對他們的權威，卻承認他在另一個領域的地位，這是件荒謬的事。再者，《聖經》未就臣民對（其）國王的服從設下任何上限。倘使國王的命令違逆上帝的意旨，（那麼）是下達命令的國王，而非服從國王的臣民，將接受上帝的裁判。國王享有至高的地位，這並非創新之舉。以色列的國王這麼做，羅馬的皇帝們如此，英格蘭的古代君王們亦如是。稱呼國王為英格蘭教會在世間的最高領袖不過是以坦率的言詞表達一項既存的權利。⁸⁷

加德納認為臣民有服從的義務，不管是面對上帝，抑或國王。而「忠君」與「虔信」兩者並不衝突，因為「國王是上帝在世間的代理人」，服從國王就是服從上帝，服從真理。國王享有世間的至高地位（不分宗教或政治），自古皆然。面對至高的國王，臣民唯有全然地服從。裁判國王是上帝的工作。

加德納援引《聖經》為據，闡釋「服從」的意義。他的論證顯示，他在 1534 年的危局中選擇效忠國王，承認「繼承法」的條文，並非全然出自「狡詐」的野心抑或「亂世浮沉」的考量。他的選擇有著神學信仰的依據：他相信國王是上帝揀選的代理人（不是教皇），所以服從國王便是服從上帝，兩者並行不悖。

加德納的想法可在 1535 年發表的另一個作品《你若坐在她身邊》（*Si sedes illa*）得到進一步的印證。這是一篇為「亨利八世處決費雪」一事辯護的短文。加德納在文中抨擊費雪拒絕依順國王的意志。他表示：費雪冒犯的不僅是「人」（man，指亨利國王），他同時冒犯了「神」，因為國王是上帝在世間「唯一的代理人」（only vicar）。即使面對的是邪惡且殘暴的國王，服從仍是臣民不容置疑的本分（absolute duty）。臣民甚至沒有提出質疑或反對的權利，他只能溫和、恭順，且耐心地承受一切不合理的對待。國王只對上帝負責。教皇不能妄稱擁有至高地位，他只是個主持儀式的教士，隨時可被撤換。教會在國家內不應享有任何特權；它唯一的工作便是宣教，

⁸⁷ Muller, *Stephen Gardiner and the Tudor Reaction*, p.61.

它甚至連管理自己的權利都不具備。⁸⁸

加德納的論述明確地申論了費雪的「罪行」(sin)：費雪捨本逐末，誤將「主持儀式」的教士「羅馬主教」(bishop of Rome)⁸⁹奉為教會的最高領袖。他冒犯了上帝在世間的代理人——亨利國王；他逾越了人臣的服從本分，犯下違逆國王，也違逆上帝的大罪。費雪被處決，合情合理。加德納在兩個作品中所展現的立場相當一致，其間的關鍵尤在「國王是上帝於世間『唯一的代理人』」一詞上。加德納反對的不是天主教的信仰內容，⁹⁰他反對的是「以教皇為教會之首」的羅馬教會體制。這是他與費雪最大的不同之處。

加德納的思想與費雪、波爾等人有明顯的差距。乍看之下，他的立論反而與新教神學家庭戴爾(William Tyndale, c.1494-1536)，甚至是路德更為接近。庭戴爾對於「服從」一詞亦曾提出過討論。他在《一位基督徒的服從》(*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1528)書中表示，王權來自上帝，人們對於國王因此有服從的義務。因為保羅在《羅馬書》中曾經揭櫫：「人世間的所有權力均來自上帝。人世間獲得權力的人，便是上帝的代理人。」⁹¹

然而，加德納與庭戴爾等人的「意氣相投」只是「短暫同行」，因為他與新教改革者在教義上有著根本的差異。加德納支持七項聖禮，他主張「教階制度」(hierarchy)。他的立場在反對愛德華時代的教會改革中，清楚展現。他與大力批判天主教會聖禮的庭戴爾非常不同。所以說，加德納支持亨利八世脫離羅馬教會，但他不支持英格蘭教會朝廷戴爾、路德、乃至於喀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的思想傾斜。他是個宗教上的「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st)，也或者稱為「傳統主義者」(traditionalist)更為貼切。他接受基督教會幾百年來在英格蘭宣揚的信仰內涵，也奉行儀典聖禮。加德納是個「尊奉君王」的「傳統信仰者」。而值得強調的是，加德納並非異數。在1530年代，甚至整個都鐸王朝，絕大多數的英格蘭人民都與加德納一樣，是懷抱著「忠君」信念的傳統信仰「虔信」者。加德納不曾公然起身反抗亨利八世，正說明了絕大多數的英格蘭人民無法揭竿而起的心理猶豫。而

⁸⁸ Gardiner, "Gardiner's Tract on Fisher's Execution", in *Obedience in Church and State*.

⁸⁹ 此為宗教改革後，亨利八世陣營對羅馬教皇的一貫稱呼。

⁹⁰ 此點見下面的申論。

⁹¹ 《羅馬書》13：1-8中寫道：「讓每一個靈魂都順從於較高權力者的權威吧」，因為「世上只有上帝方有權力，所有權力均來自於上帝的任命」，「反抗權力便是反抗上帝的任命」。William Tyndale,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1528; London: Penguin, 2000), p. 36.

加德納在愛德華六世時代對於傳統信仰的堅持，適足以解釋英格蘭遲遲無法完成所謂的「民間宗教改革」(Popular Reformation)，蛻變成爲全然新教國家的原因。⁹²

四、結論：亨利八世與他的知識菁英

在回報他人方面，亨利八世性格裡有項突出又令人厭惡的特質：安普生 (Empson) 與達德利 (Dudley)；烏爾西、摩爾，與克倫威爾；亞拉岡的凱撒琳與安·葆琳；巴尼斯 (Barnes) 與諾弗克——一個接著一個，被他冷笑著摧毀或棄置一旁，一旦他們再無利用價值。⁹³

史托基教授 (Charles Sturge) 的這段話精簡而生動地標舉出亨利八世的用人特色。對他而言，所有的人 (從妻子、女兒，到大臣) 都是達成目的後「可拋棄」的工具；一旦沒有利用價值，亨利八世便會毫不留情地處置 (死) 或驅逐他們。亨利八世對待周遭人士或者不無真情：他曾有意探望被葆琳刻意隔離的瑪麗公主；⁹⁴ 他也曾厚待賞識的貴族青年波爾。然而，只要他們的想法與他的意志相違，他便會捨棄人情，毫不猶豫地拔除阻礙在面前的障礙。史托基對亨利八世的評論相當深刻，而史托基所觀察到的，正是亨利八世對知識菁英抱持的基本態度：只要違逆國王的意志，任何人都可以剷除。

亨利八世如此看待他的菁英，他的知識菁英又是如何對待國王？經由本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在這些菁英心中存在著兩種深刻的價值——「忠君」與「虔信」。

⁹² 「宗教改革何時在英格蘭完成？」這是學界關注的核心議題。研究者辯論的焦點是：英格蘭並未在亨利八世建立「獨立的英格蘭教會」(即所謂「官方宗教改革」的完成)的同時，完成信仰的改宗 (conversion)。最早提出此論點的是 Christopher Haigh。Haigh 在其 *Re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udor Lancashi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一書中，以英格蘭西北的 Lancashire 爲證，指出該地並未隨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推動而改變信仰。Haigh 此番革命性的論點提出後，學界遂逐漸形成宗教改革應將亨利八世的「官方宗教改革」以及英格蘭民眾的「民間宗教改革」分成兩個區塊研究。「官方宗教改革」大致在亨利八世朝初步達成 (雖然後續仍有許多的紛擾及擺盪)。然而「民間宗教改革」何時發生？如何發生？何時完成？學界至今仍無定論。相關研究可參見李若庸，〈評 Peter Marshall, *The Impact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00-1640*〉，《新史學》，9：4 (臺北，1998.12)，頁 171-177。

⁹³ Charles Sturge, *Cuthbert Tunstall: Churchman, Scholar, Statesman, Administrator* (London: Longmans, 1938), p.228. 安普生 (Sir Richard Empson, d.1510) 與達德利 (Sir Robert Dudley, c.1462-1510) 都是亨利七世時代的財政官員。他們因爲替國王整頓財政，引來民怨。亨利八世即位不久，便將兩人處決以收攬人心。巴尼斯 (Robert Barnes, c.1495-1540) 是英格蘭早期的新教改革家，爲克倫威爾所倚重。但因爲亨利八世最後決定英格蘭教會不再朝新教傾斜，遂在 1540 年將他處決。在史托基提及的八個人中，只有凱撒琳王后與諾弗克公爵兩人沒有成爲亨利八世的刀下亡魂。

⁹⁴ *Letters and Papers, Henry VIII*, vol.7, no.83.

這兩種原本「和諧」的價值，因為宗教改革的推動而產生了衝突：對羅馬天主教會的「虔信」抵觸到「對國王的忠誠」。1534 年「繼承法」的通過，讓所有菁英都必須表態；「忠君」與「虔信」在他們心中劇烈激盪：費雪、摩爾、波爾，加德納，無人得以倖免；他們都得在這兩種價值間做出選擇。於是，「忠君」與「虔信」在不同的菁英身上發揮不同的影響力：殉道的費雪與摩爾將「虔信」放在「忠君」之上，他們無法為了服侍國王放棄自己的宗教良知。而屈服的加德納以「忠君」等於「虔信」來說服自己，選擇在信仰議題上支持國王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做出何種選擇，這些知識菁英都未曾完全放棄任何一項價值：選擇「忠君」的菁英固然放棄了自主的宗教表達，選擇「虔信」的菁英也未曾忘懷「忠君」的信念。流亡的波爾時刻惦念著讓國王「回歸正途」，而殉道的費雪與摩爾選擇以死亡來成全某種意義上的君臣之義。因為「忠君」的信念，讓「不積極作為」成為許多知識菁英最後的決定，這也使得他們無法發揮應有的牽制力量。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來理解「忠君」與「虔信」雙重價值所造成的深刻影響。沙根在分析亨利八世化解 1536 年「聖寵朝聖行」(Pilgrimage of Grace) 的叛亂危機時，曾提出亨利八世操作叛民「忠君」情緒的手法。沙根表示，亨利先以懷柔的含糊承諾，安撫對國王懷抱敬意的大部分叛民，讓他們自動返家。然後再動用武力，以強勢的鎮壓手段對付堅持抗爭的少數群眾。價值的衝突造成了群體的分裂，削弱了反對力量。⁹⁵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亨利朝的知識菁英身上。

菁英階層的價值分裂早在 1530 年初凱撒琳的離婚爭議中顯現出來。在離婚事件裡，天主教會明顯站在凱撒琳這邊。然而幾乎所有知識菁英，從摩爾、波爾，到加德納（甚至費雪最後也默認了國王的決定）都選擇支持國王的立場。他們不一定同意國王的作為（凱撒琳是位德行兼備的虔誠王后），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為了「天主教」的王后，違逆他們的國王。這個事件顯示，「忠君」價值深植人心。如果不是亨利脫離羅馬教會的作為過於激進，讓「虔信」與「忠君」的衝突白熱化，到達無可妥協的程度，亨利八世的知識菁英恐怕還會努力地在「忠君」的架構下，掙扎地尋找可能的妥協出路。

「忠君」與「虔信」都是深植於都鐸菁英內心的信念。亨利八世的執意作為讓他們面臨兩項價值的激烈衝突，他們被迫為兩種並存的價值排出順序。菁英們不同

⁹⁵ Shagan,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的排序選擇，造就了不同的結論：他們有的選擇屈服，有的選擇流亡，有的選擇殉道。姑且不論選擇過程中個別菁英曾經有過的內心掙扎，就整體而言，我們可以說，深陷兩種價值拉扯的菁英階層，給予亨利八世拉攏與脅迫的操作空間。於是，知識菁英分裂成為支持與反對國王的兩大陣營。分裂的菁英再難對國王產生預期的制止力量。甚至，根深柢固的「忠君」信念，讓選擇殉道的摩爾與費雪，即便走上了行刑高台，也不願意透露一句違逆國王的公開遺言。而如果「忠君」價值是都鐸王朝得以「成就盛世」的原因，那麼我們或可合理推論，「失去英格蘭子民對於王室的不悔支持」，是斯圖亞特家族「邁向失敗」的重要關鍵。

參考書目

- Bradshaw, Brendon and Duffy, Eamon (eds.), *Humanism, Reform and the Reformation: The Career of Bishop John Fis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ridgett, T.E., *Life of Blessed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Cardinal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and Martyr under Henry VIII* (London: Burns & Oates, Limited, 1888).
- Dowling, Maria, *Fisher of Men: A Life of John Fisher, 1469-1535*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 Dowling, Maria, *Humanism in the Age of Henry VIII* (London: Croom Helm, 1986).
- Fisher, John, *English Works of John Fisher, Bishop of Rochester (1469-1535): Sermons and Other Writings, 1520-1535*, ed. Cecilia A. Ha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ardiner, Stephen, *Obedience in Church and State: Three Political Tracts by Stephen Gardiner*, ed. and trans. by Pierre Janel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 Gasquet, Cardinal, *Cardinal Pole and His Early Friend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27).
- Haigh, Christopher, *Re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udor Lancashi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Letters and Papers, Foreign and Domestic,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ed. J. S. Brewer, J. Gairdner, and R.H. Brodie, 21 vols. and addenda (London: Longman & Co., 1862-1932).
- MacCulloch, Diarmaid, "Two Dons in Politics: Thomas Cranmer and Stephen Gardiner, 1503-1533,"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7:1 (March 1994), pp.1-22.
- MacCulloch, Diarmaid, *Thomas Cranmer: A Life*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ayer, Thomas F.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Reginald Pole, vol.1: A Calendar, 1518-1546: Beginnings to Legate of Viterbo* (Aldershot: Ashgate, 2002).
- Mayer, Thomas F., *Reginald Pole: Prince and Proph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uller, James Arthur, *Stephen Gardiner and the Tudor Reaction*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6).
-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Redworth, Glyn, *In Defence of the Church Catholic: The Life of Stephen Gardin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 Shagan, Ethan H.,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turge, Charles, *Cuthbert Tunstal: Churchman, Scholar, Statesman, Administrator* (London: Longmans, 1938).
- Surtz, Edward, *The Works and Days of John Fish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sition of St. John Fisher, 1469-1535, Bishop of Rochester,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and the Re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Tyndale, William, *The Obedience of A Christian Man* (1528; London: Penguin, 2000).
- Woolfson, Jonathan, *Padua and the Tudors: English Students in Italy, 1485-1603* (Cambridge: James Clarke & Co Ltd, 1998).
- 李若庸，〈評 Peter Marshall, *The Impact of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1500-1640*〉，《新史學》，9：4(臺北，1998.12)，頁 171-177。

Loyalty or Piety: Intellectual Elites' Resistance and Compromise under King Henry VIII

Lee, Juo-Yung*

Abstract

In 1534, Henry VIII, with the aid of the Parliament, passed the Act of Succession, which declared the new-born princess Elizabeth by Anne Boleyn the only legitimate heir to the throne. According to the statute, all English subjects were obliged to swear to the Act, which means to accept not only the content of it, but the theological prerequisite—"Royal Supremacy"—as well. Soon after, Treasons Act was promulgated; according to it, anyone rejecting to swear to the Act of Succession was considered traitor, at a cost of his life. English subjects therefore faced a new challenge in 1534: they were to decide whether to give up the Pope and to take King Henry as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o secure the support of his subjects, Henry VIII systematically asked the English to swear: his elites were forced to declare their stands, as the King try to persuade, threaten, imprison, or even execute them. Henry's radical action was unprecedented; the entire elite class was perturbed. We thus come acro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y did the Tudor elites, many of them noted humanists, fail to resist or to avert the "fanatic" move of the King? What were their mentality, considerations, judgment, and choic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paper is to divide the Henrician elites into three groups for investigation: they are "the elites martyred", "the elites exile", and "the elites surrendere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Key words: Henry VIII, Persecution, elites, Reformation